

《周易》古经在中国哲学史论著中的出场^{*}

秦洁

(山东大学 易学与中国古代哲学研究中心, 山东 济南 250100)

[摘要] 在百余年来中国哲学史论著中,《周易》古经经历了由缺席到出场的过程。这一前后差异,出于撰写者对《周易》古经性质的不同认识,亦出于哲学流行趣味的变化,反思百余年来相关讨论,应充分确认《周易》古经的哲学性,尤其应确认易卦符号系统的整体意义及卦爻辞所彰显的价值取向,这些内容早已超越了卜筮,而深具人文性、思想性、哲学性。《周易》古经与商周之际的思想变革紧密相关,是周文化的重要典籍代表;同时,《周易》古经对儒、道等诸子哲学影响深刻,与《易传》哲学有连续性,是前诸子时代的主要哲学典籍,就现存早期典籍而言,应该确认《周易》古经之于中国哲学的大本大源地位,乃至确认《周易》古经在中国哲学史撰写中的开篇地位。

[关键词] 《周易》古经;中国哲学史;《周易》性质;经传关系

[中图分类号] D092;B22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1763(2025)05-0034-08

The Presence of the *Classic of Changes* in Treatises on the History of Chinese Philosophy

QIN Jie

(Center for Zhouyi & Ancient Chinese Philosophy, Shandong University, Jinan 250100, China)

Abstract: In the treatises on the history of Chinese philosophy over the past hundred years, the *Classic of Changes* has undergone a significant shift from absence to presence. This contrast in the early and late versions derives from compilers' divergent understandings of the nature of the *Classic of Changes* as well as shifts in popular philosophical interests. Reflecting on the related discussions over the past hundred years, the philosophical nature of the *Classic of Changes* should be fully recognized, especially the overall significance of the Yi hexagram symbolic system and the value orientation demonstrated in the hexagram and line statements. These aspects have long transcended divination and are deeply imbued with humanity, ideativeness and philosophicality. The *Classic of Changes* is closely related to the ideological transformation during the Shang-Zhou transition, serving as a canonical representative of Zhou culture. Meanwhile, it has deeply influenced the philosophy of the Hundred Schools that flourished during the Pre-Qin period—such as Confucianism and Taoism—and has demonstrated continuity with the philosophy of the *Yizhuan* (Commentaries on the Changes), making it a major philosophical classic of the pre-Hundred Schools era. Among surviving early Chinese canons, the *Classic of Changes* should be widely confirmed not only for its fundamental and original status of Chinese philosophy but also for its opening position in the history of Chinese philosophy.

* [收稿日期] 2024-07-08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近现代易学的转型与发展研究(23CZX032);泰山学者工程专项经费资助

[作者简介] 秦洁(1990—),男,山东日照人,山东大学易学与中国古代哲学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中国经学研究中心研究员,博士,研究方向:中国哲学。

Key words: the *Classic of Changes*; history of Chinese philosophy; the nature of the Zhouyi;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lassics and commentaries

一 引言

《周易》古经在经学时代拥有崇高的地位。这一崇高地位有几个前提支撑:其一,在经学的氛围中,《周易》古经被奉为由圣人所作的、载圣人之道的经典;其二,基于经、传、学的合一,《易传》乃至后世《易》注之思想均被用来襄赞古经;其三,易道、易卦符号被用于涵摄多种知识,即《四库全书总目》所谓“易道广大,无所不包”。近代以来,随着新学的传入,经学迅速瓦解,四部之学转向为分科之学。在学术大变革中,支撑《周易》古经备受推崇的三个前提均不复存在:经学观、圣人观被打破,经书被还原为旧典籍;考证之风兴起,《周易》经传被强调为不同时代的作品,经传的一贯性不再被承认;在分科之学中,各学科不再受经学的统摄,且经书被划分到不同学科之中,其中《周易》被归入哲学学科。

基于分科之学,《周易》开始存身于中国哲学史论著之中。随着《周易》经传的分观,《易传》的哲学性受到学界一致的肯定,而《周易》古经有无哲学、有何种哲学、在中国哲学史中占据什么地位,则成为百余年来争议很大且至今没有解决的问题。近年来,中国哲学的自主性、重写中国哲学史等问题颇受关注,在这样的背景下,有必要反思《周易》古经在百年中国哲学史论著中的不同呈现,进而期许《周易》古经的新出场。

二 胡适的主张与《周易》古经的缺席

在早期的中国哲学史论著中,胡适所著《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与冯友兰所著《中国哲学史》上下卷是公认的代表。胡著《中国哲学史大纲》对《周易》哲学的阐释较为简略,但其关于《周易》文本的基本主张影响极大,值得我们特别注意。

胡适撰写《中国哲学史大纲》,在《前言》部分特别强调了其对史料辨伪的重视。就《周易》而言,胡适不满传统易学通贯经、传、注疏的做法^①,而主张彻底区分《周易》古经、《易传》与历代易学。他认为,“如汉人用分野、爻辰、卦气说《易经》,宋人用太极图、先天卦位图说《易经》”等,都是对《周易》“真面

目”的障蔽。^{[1]6}“《易经》这一部书,古今来多少学者做了几屋子的书,也还讲不明白。我讲《易经》和前人不同。我以为从一切河图、洛书、讖纬术数、先天太极……种种议论,都是谬说。如今若要懂得《易》的真意,须先把这些谬说扫除干净。”^{[1]59}这是将《周易》经传与后世易学、易说区分开来。在此基础上,胡适继续割裂经、传,并区别认识经、传的性质。其云:“至于《易经》更不能用作上古哲学史料。《易经》除去《十翼》,只剩得六十四卦,六十四条卦辞,三百八十四条爻辞,乃是一部卜筮之书,全无哲学史料可说。”^{[1]15}胡适将《周易》经传认定为性质完全不同的两种著作。对《易传》而言,胡适认为其有很强的哲学性,是孔子哲学的代表性作品,其云:“一部《论语》虽不是孔子做的,却极可靠,极有用……研究孔子学说的人须用这书和《易传》《春秋》两书参考互证,此外便不可全信了。”^{[1]53}对《周易》古经而言,胡适在没有给出理由的情况下,直接主张其完全是一部卜筮之书,“全无哲学史料可说”。基于对《周易》古经的这一认识,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在诸子哲学之前,仅用《诗经》作为思想背景,而全然不论《周易》古经。

主张《周易》经、传、注疏分离,定性《周易》古经为卜筮之书,没有哲学价值,胡适关于《周易》古经的这两点主张,在很长的时间里成为主流观点,也造成了《周易》古经在中国哲学史论著中的长期缺席。

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便完全承继了胡适对《周易》古经的这两点主张。其云:“《易》是本有,是儒家所述,而《系辞》《文言》等,则儒家所作,而《易》在思想史上的价值,亦即在《系辞》《文言》等。”“若使《周易》离开《系辞》《文言》等,不过是卜筮之书……在中国历史中,自汉迄清,有大影响于人心者,非《周易》,而乃带《系辞》《文言》等之《周易》。”^{[2]44}正因坚持经传分离,坚持《周易》古经为卜筮之书、无哲学价值,故冯友兰《中国哲学史》在诸子之前亦完全不论《周易》古经,此外,相较胡著,冯友兰撰写哲学史,有更加明晰的方法自觉。从其《绪论》部分来看,冯友兰对《周易》古经的态度,有两点方法之自觉。第一,准以西方哲学。西方哲学在诞生之初,便与旧的文化传统割裂开来,与前哲学时代的宗教、神话、预测等区别明显。若准西方哲学而言,《周易》古经“本为

^① 传统易学并非不论经传的时代区别,如朱熹便特别注重区分伏羲之易、文王之易、周公之易、孔子之易,但传统易学家又同时认为易卦、经文、传文在道理上有其密切联系的一贯性。这种重视文本相关性的做法,恰恰是近代学者重点抨击之处。

卜筮之书”，自然不应与哲学的出现有过多联系。第二，受进化论影响，哲学与文化也被认为符合后出转精的发展规律，据此，《周易》古经作为出现时代极早的作品，便很难被认为蕴含深刻的哲学思考。

虽然冯友兰先生自觉区分《周易》经传、否认《周易》古经的哲学性，但详考其对《易传》哲学的讨论，可发现其间有龃龉之处。冯友兰对《易传》哲学进行了整体阐释，其云：“八卦所代表者为宇宙之根本”，乾坤阴阳“交合而能生万物”，“而乃有发展变化”，“变化是循环的”，“发展至一定程度，则即变而为其反面”，人又“取法”变化公例用于“处世接物”。^{[2]216-224}考冯先生所论，固然是据所引《易传》文本，但这些思想其实多已见于《周易》古经。如其引《泰·象》“无往不复，天地际也”、《复·彖》“反复其道，七日来复”等，论说道：“‘反复其道’‘无往不复’，宇宙间事物之‘往来’‘屈信’，皆如日月寒暑之循环往来，此所谓‘复’。”^{[2]220}“无往不复”和“反复其道”，实际出自泰卦九三爻辞和复卦卦辞。更为重要的是，卦爻辞又与卦爻象相关，即泰九三爻处于下乾上坤之间，正是“无平不陂，无往不复”的变化之时；复卦为阳爻“来复”，与剥象正相反，由剥复循环变化，正体现“反复其道，七日来复”之义。据此而言，“变化是循环的”这一观点，显然在《周易》古经中便已经发展完备，冯先生明引《易传》、暗用古经的做法，是不妥当的。再如，冯先生论物极必反之理，云“故《乾卦》六爻，以九五为最善。至于《乾》之上九，则为‘亢龙有悔’，有‘穷之灾’矣”^{[2]220}，这已经是直接引《周易》古经并用爻位之象了。又如冯先生所论八卦、阴阳之说，固然《易传》的相关讨论更具系统性，但阴阳爻为基本的易卦符号，六十四卦由八卦相重而来，这些都在《周易》古经中有明显呈现，也不可仅视作《易传》的思想。又如乾坤阴阳生万物之说，其实在《周易》古经以纯阴阳的乾坤为首、以表征生物的屯卦为第三卦的卦序之中，就有充分的表达。总之，冯先生所论《易传》哲学之内容，多已见于《周易》古经。冯著或明或暗地用到《周易》古经，而又不承认古经的哲学价值，这是不能自洽的。

胡适、冯友兰对《周易》古经性质的判定，在较长时间内成为学界的主流观点。如钱玄同称：“六经固非姬旦底政典，亦非孔丘底‘托古’的著作。六经底大部分固无信史底价值，亦无哲理和政论底价值。”^{[3]69}顾颉刚亦认为《周易》古经“原来只是一部占卜的书，没有圣人的大道理在内”^{[4]45}。又有傅铜作《周易无哲学价值说》一文，专论《周易》古经无哲学价值，称“为卜筮之书的《周易》，其目的在实用，并不在知识之自身”，“若想认识《周易》的本来意义，必

须把他当作很粗浅的东西”^[5]。又如张岱年所撰《中国哲学大纲》，其实注意到了冯著的龃龉之处，因而论说道：“反复的观念在《易爻辞》已有之，《易·爻辞》的年代颇早，大概是西周时代的作品。《易·泰卦·爻辞》云：‘无平不陂，无往不复。’又《复卦·爻辞》云：‘反复其道，七日来复。’认为一切事变都是反复的，反复是一普遍的原则……《易传》中的反复学说，在根本上是根据《爻辞》中所说而加以发挥。”^{[6]158-160}张著又在论“两一”哲学时，称：“《易·爻辞》所说‘无平不陂，无往不复’（《泰卦》），可以说是两一观念之萌芽。平与陂对待，而平必有陂；往与复对待，而凡往必复。对待常有其合一。”^{[6]168}虽然明确关注《周易》古经，但张著所论仅限于“无平不陂，无往不复”“反复其道，七日来复”两句文辞，且不讨论《周易》古经本身的哲学性问题，这显然还是深受胡、冯之观点的影响。

当然，在早期关于中国哲学的相关讨论中，也有与胡、冯相区别的观点。如刘师培、马一浮、熊十力等论《周易》哲学时，虽然均以引《易传》文字为主，但却秉持经学时代的观念，承认经传的一贯性，兼引古经而统论为《周易》之哲学。这种经传合一的研究，在港台地区的中国哲学史论著中延续了很长时间。但因其通讲经传且以引《易传》为主，故而实际没有对《周易》古经哲学进行系统的阐明。又如谢无量编著的《中国哲学史》，特别重视易卦符号，开篇即论说易卦的哲学。^{[7]3-9}又如高亨专作《周易筮辞中有无哲学》一文，举临卦卦爻辞为例，反驳傅铜之观点，提出“《周易》筮辞颇有周初人之人生哲学及政治哲学，蕴于其中”^{[8]2}。而梁启超更早在1922年发表的《评胡适之中国哲学史大纲》一文中，便批评胡适忽视《周易》古经哲学的做法。梁启超云：“胡先生曾说‘大凡一种学说，决不是劈空从天上掉下来的’，这话很对。可惜我们读了胡先生的原著，不免觉得老子、孔子是‘从天上掉下来’了……依我看来……《诗》《书》《易》《礼》四部经，大部分是孔子以前的作品，那里头所含的思想，自然是给后来哲学家不少的贡献……《易经》爻辞说的‘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直方大’‘观我生进退’‘不远复，无祇悔’等等，都含有哲学上很深的意义。”^[9]梁启超之批评，切中肯綮，酣畅淋漓。梁启超又整体论定《周易》古经的哲学价值，认为“此书为孔子以前之哲学书，孔子为之注解”^{[10]2}。然而，这些肯定《周易》古经哲学价值的观点，并没有被当时流行的中国哲学史论著所吸收。整体来看，《周易》古经在早期流行的中国哲学史论著中是隐身的。

三 唯物辩证法的流行 与《周易》古经的出场

《周易》古经在中国哲学史论著中的正式出场,与唯物辩证法密切相关。随着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唯物辩证法很快与《周易》产生了关联,这便在一定程度上间接肯定了《周易》古经的哲学价值。如王述先1935年发表《易经与唯物辩证法》^[11]一文,开篇便从阴阳爻讲起,将卦画符号与唯物辩证法对立统一之观点相比附,这显然是肯定了《周易》古经所蕴含的辩证法思想。再如金景芳作《易通》一书,在尾章“周易与唯物辩证法”中,也是杂糅易卦符号、卦爻辞、传文,从整体《周易》出发,确认其与辩证法的关系,金景芳于书中云:“中国之《周易》,与西土之唯物辩证法,事隔几千年,地距几万里,而其说若合符节,洵属大奇!”^[12]¹⁵⁴

新中国成立后,伴随着唯物辩证法成为主流哲学形态,《周易》古经也开始在哲学史论著中正式出场。其中,冯友兰改变了早年的看法,撰《〈易经〉的哲学思想》一文,专论《周易》古经之哲学。冯氏云:“从来源上说,《周易》完全是一部占卦的书。”^[13]⁶²比较而言,冯氏在撰写《中国哲学史》时径直定性《周易》古经为卜筮之书,此时则加了“从来源上说”这一限定,这便为阐释经文之哲学留出了余地。具体到《周易》古经之哲学,冯先生认为:“《周易》的辩证法思想,也可以从六十四卦排列的次序上看出来。在《易经》里面,相反的卦总是排列在一起。例如乾和坤,泰和否,剥和复……这些例子说明《易经》里可能初步地有‘物极必反’的辩证法思想。从卦爻的排列上看,也可以看出来《易经》可能有这种思想。例如乾卦是一个大吉的卦,从初九到九五,都不错。最吉的一爻是九五。上九比九五有更进一步的发展,可是上九就不好了,因为它发展过度成为‘亢龙有悔’了。从某些爻辞上也可以看出《易经》有辩证法思想。泰卦九三的爻辞说:‘无平不陂,无往不复,坚贞无咎。’这就是说,平的东西总要转化为不平的东西,已经走掉的东西,总还要转回来。”^[13]⁶⁴总之,以唯物辩证法为标尺,则《周易》古经也有契合此理论之内容。因而冯友兰总结说:“照上面所讲的,我承认《易经》之中有很多有价值的哲学思想。”^[13]⁶⁵①“我也认为《易经》的经文中素朴的唯物主义和自发的辩证法思想。”^[13]⁶⁶冯友兰晚年撰写《中国哲学史新编》,便基本沿用《〈易经〉的哲学思想》一文之论说,于开

篇商代和西周时代一章中,专论“古代素朴唯物主义和自发的辩证法思想的萌芽”一节,肯定《周易》古经中的“阴阳”“八卦”思想。^[14]²⁵⁻³⁰

20世纪60年代,中国大陆地区有过关于《周易》经传关系及研究方法的讨论,其中易卦符号和一些卦爻辞受到特别的关注,这实际推进了对《周易》古经哲学的研究。然而,随着反对以传解经的主张占据绝对的上风,对《周易》古经哲学的进一步探索也戛然而止。以任继愈为例,其于1961年在《光明日报》发表专文讨论《周易》古经的哲学,文章积极肯定“《易经》哲学思想的基本内容”包括“观物取象的观念”“万物交感的观念”“发展变化的观念”,认为其中“包含着辩证法的真理”。^[15]但在随后出版的《中国哲学发展史》中,任先生不再提《周易》古经的“哲学”和“辩证法思想”,只说其中有一些“思维材料”,并将前期所论许多古经哲学的内容归入《易传》,而明确提出“《周易》的经部(包括卦画和筮辞)并不是哲学,而是宗教巫术”^[16]⁵⁹⁰。这一观点反复显然源于这一年代之讨论。实际上,冯友兰在《中国哲学史新编》中论说“古代素朴唯物主义和自发的辩证法思想的萌芽”,而不再称“《易经》的哲学”,也应是受到相关讨论之影响。除冯著、任著外,北京大学哲学系主编的《中国哲学史》亦颇为流行,其对《周易》古经的关注,大体承继了冯著的观点,论说《周易》古经中的“对立”和“物极必反”思想,称其为“朴素辩证法思想的萌芽”。^[17]⁹⁻¹¹其他如萧萐父、李锦全主编《中国哲学史纲要》^[18]²⁴⁻²⁷、上海师范大学等九所院校《中国哲学史稿》编写组编《中国哲学史稿》^[19]⁸⁻¹⁹、李维武《中国哲学史纲》^[20]¹⁶⁻¹⁹等,也都是以谈论《周易》古经中的朴素辩证法思想为撰写之要。

总之,随着唯物辩证法的流行,《周易》古经受到特别的重视,在中国哲学史论著中开始出场;但经过对《周易》研究方法的讨论,尤其是因对经传时代、性质区别的严格强调,《周易》古经的出场又显得“跌跌撞撞”,而被冠上了“早期”“朴素”“萌芽”等限定词汇。

近二十年来,随着哲学流行趣味的变化,中国哲学史的撰写也更为关注自身的表述与问题。但《周易》古经的出场毕竟是借唯物辩证法之流行,故而随着撰写重心的变化,《周易》古经的出场呈现被弱化的倾向。如冯达文、郭齐勇主编的《新编中国哲学史》主张“就《易经》本身而言,它涉及的许多问题不是概念化的哲学问题,而是借象数表露信仰的人类学问题”^[21]¹⁸,近来张学智撰写的《中国哲学概论》则

① 引文中所称“《易经》”指《周易》古经部分。

明确称“如果没有十翼,《周易》只是卜筮之书”^{[22]47}。又如郭齐勇独著的《中国哲学史》在论及《周易》古经时,认为“开始时,两爻并不代表阴阳,很可能是长短蓍草的表示,以后才有了奇偶的意思……八卦在开始时也不具有象征天、地、雷、风、水、火、山、泽等事物的意义。以上意义都是在春秋时,人们增加上去的”,这实际是不再讨论易卦符号在古经时代的意义。而对于卦爻辞部分,郭著用词也极为谨慎,如引乾卦经文认为“有一定的哲理性”,又比较泰否等卦认为“也反映了作《易》者或编纂者的相互联系、相对相关、互补互动的意识”。^{[23]19-20}总之,就整体趋势而言,近些年出版的中国哲学史论著普遍对《周易》古经着墨较少,且多谈文本结构,少谈、甚至不谈古经哲学。

值得注意的是,劳思光《新编中国哲学史》讨论“《易经》中之‘宇宙秩序’观念”^{[24]62},刘文英《中国哲学史》明确肯定《周易》古经与《洪范》等为“中国哲学的开端”^{[25]16},张立文、罗安宪主编,杨庆中撰写的《中国哲学史教程》“先秦哲学”部分特别点明“《周易》卦爻辞所体现的宗教信仰、‘德’性价值、政治理念等,与周初统治者的思想观念完全一致”^{[26]8-9},这几部著作均表现出重视《周易》古经文本自身所是、肯定古经之于中国哲学发端的意义等特点,这在两岸中国哲学史论著中是不多见的。

近来,郭齐勇主持编写多卷本《中国哲学通史》,《先秦卷》更由其亲自担纲撰写。《中国哲学通史·先秦卷》对《周易》古经的处理颇可玩味。一方面,《先秦卷》据更为广义的哲学概念,明确称“《易经》的哲学”,并分“卦爻画中的哲学思想”与“卦爻辞中的哲学思想”,汇总近些年来的学界成果,系统论说《周易》古经之哲学,展现出了回归《周易》文本、概念而系统研究之态度,这种态度显然是超越过往哲学史论著的。但另一方面,《先秦卷》又将《周易》古经从属于《易传》,整体置于后期墨家之后,这实际是将《周易》古经在先秦哲学中“悬置”了起来,而这一章节安排形式已然回到了冯友兰的两卷本《中国哲学史》。^{[27]454-471}由《先秦卷》的相关处理,可见《周易》古经在中国哲学史论著中的出场安排仍是一个棘手的问题。

四 对研究方法的反思

反思、总结《周易》古经在百年中国哲学史论著中的缺席、出场以及出场角色的变化,可以发现引发这些差异的关键性问题,仍然是胡适所特别主张的经传关系与《周易》古经的性质问题。

关于《周易》经传之关系,有两种不恰当的、相反的观点,也造成了中国哲学史论著处理《周易》古经的两种做法。一种做法是沿用经学时代的惯例,不特别关注经传之间的差异,而统论《周易》哲学。这是刘师培、马一浮、熊十力等论《周易》哲学所用的方法,也是在很长时间之内,许多港台学者和部分内地(大陆)学者讨论《周易》哲学所坚持的态度。经传不分,固然有助于更为完整地阐发包括古经在内的《周易》之哲学,但问题是《周易》经传的言说特点不同,古经并不直接阐发理论,《易传》则多有系统论理之言。因此这一路学者之研究,常常径直引用《易传》,而没有特别点出《易传》所论在《周易》古经中的根据。据《易传》文辞所进行的哲学阐发,显然不能直接等同于《周易》古经的哲学。换言之,完全不区分《周易》经传的做法,实际是没有真正研究“《周易》古经哲学”这一问题。

与经传不分的路子相对,胡适主张区分《周易》经传,这一态度在民国时期、在20世纪60年代均被特别严格地强调。《周易》经传产生于不同的时期,有各自的文本特色,当然应该首先被区别看待。基于经传相分,探讨易卦符号与卦爻辞的哲学,也才是真正的“《周易》古经哲学”。但问题是,易学有自己专门的、先后承继的知识体系,《周易》经、传、学既有基于时代的差异性,又有基于专门之学的相关性。因时代的差异性,而彻底割裂经传,否认知识与理论的相关性,这在方法上同样是不可取的。换言之,《易传》固然有其理论的独创之处,但《易传》所论及的许多概念、命题与思想,其实本身就是《周易》古经中或隐或显的内容。因此,过于强调经传的时代差异,讳言《周易》经传在许多思想上的一贯性,便造成了冯友兰《中国哲学史》论说中的龃龉之处,也造成了20世纪60年代对《周易》古经研究的中断。此外,易卦符号是无言的系统,卦爻辞是古奥的文辞,彻底割裂《周易》经传、抛弃《易传》以降的解释系统,实际便很难较为准确地理解《周易》古经的结构与意义。近代以来,关于《周易》古经注释众说纷纭,对《周易》古经性质的激烈争论,很大程度上都源于对《周易》经传之过度割裂。总之,在分观《周易》经传的基础上,再充分根据《易传》的提示来仔细分析、探讨易卦符号与卦爻辞之思想,这才是研究《周易》古经哲学的允当道路。

解决《周易》古经哲学争议的另一关键性问题是,对《周易》古经性质的认识。胡适在区分《周易》经传之后,直接定性《周易》古经为卜筮之书、没有哲学价值,这是没有道理的。因《周易》古经本为时代极早的卜筮之书,而断言《周易》古经无哲学价值,这在方

法上是不自洽的、不成熟的。当然,早期对《周易》古经哲学的否认,很大程度上是因以欧洲传统主流哲学为“普遍的哲学”、为撰写中国哲学史的典范。在近代流行的哲学风潮下,哲学被认为应该是与宗教神话等截然区分的、近似“突变”产生的理性产物,因而可以“截断众流”、突然诞生老子与孔子,而作为哲学作品的《易传》也可以不再与《周易》古经有紧密的联系。又因“进化论”的流行,思想的发展被认为是逐渐进步的,而《周易》古经作为西周初年的作品,出现时代极早,因此虽然其中不乏哲学性浓厚的话语,但也只能被认定为“萌芽”而已。基于当下的认识来看,这些研究“前见”都是需要修正的。中国哲学有其独特之处,中华文明是有“早熟”特质的,是有突出连续性的。诸子时代的哲学,有更早的源头,从前诸子时代到诸子时代,更多的展现为一种传承性的变化,具有“渐进性”而非“突发性”^[28]。在“渐变”之中,非理性的卜筮与理性的哲学,也不是一种绝对对立的关系,而更像是一种纠葛的对待关系。譬如“天”的概念,在历代经典及生活语境中,都是兼具理性与非理性含义的。

基于此,我们在看待《周易》古经之时,大可不必纠结于“本为卜筮之书”和具有哲学性之间的可能冲突。《周易》古经产生于卜筮体系,本身也可用来占筮,当然具有卜筮之书的性质。但另一方面,《周易》古经不同于其他的筮书,易卦符号具有抽象性、关联性、整体性,“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无咎”“无平不陂,无往不复”“东邻杀牛,不如西邻之禴祭”等卦爻辞,都闪耀着理性的光辉。总之,《周易》古经在卜筮的基础上,蕴含着超越卜筮的价值,我们应该充分确认《周易》古经所兼具的哲学性、思想性、人文性。

此外,探讨《周易》古经的哲学,应该回到易学与中国哲学自身的语境之中,回到《周易》古经的整体文本之上。回顾《周易》古经在百年中国哲学史论著中的出场,最大的遗憾是《周易》古经从来没有自在地出场。《周易》古经的缺席是因哲学要以“普遍(欧洲)的哲学”为标准;《周易》古经的出场又是主要因为“唯物辩证法”的流行,故而《周易》古经的哲学多被等同于“辩证法”,而且要被限定为“萌芽”。在这个过程中,《周易》古经自身的、整体的哲学内容,却是中国哲学史论著不太关心的问题。又因《周易》古经身影的长期“模糊”状态,《周易》古经与中国哲学的开端、《周易》古经与商周时代的思想变革、《周易》古经对诸子哲学的影响等这些关乎中国哲学史撰写的重大问题,也几乎没有得到应有的关注。

五 对《周易》古经新出场的期待

在厘清《周易》古经哲学研究方法的基础上,回到作为整体的、独特的《周易》古经文本,进而将《周易》古经置于先秦哲学发展的整体脉络之中,我们可以从五个方面期待《周易》古经的新出场。

第一,系统阐释易卦符号系统之哲学。经过近年来对“数字卦”的研究,学界确认了《周易》阴阳爻本身即数字七与八^[29],这是对“大衍筮法”所得筮数六、七、八、九的归约与经典化呈现,实际也是《周易注疏》引张讥所论七八“为爻之本体”^[30]的说法。易卦符号虽然直接来自筮数,但易卦系统绝不只是各筮数的排列组合。易卦系统成立的关键之处,一方面是将筮数归约为奇偶阴阳,而得以将数字组合高度抽象为八卦与六十四卦符号系统;另一方面是将此符号系统与万事万物联系起来,而得以实现易卦系统的实际应用。若不将筮数抽象为奇偶阴阳,筮数的组合便不会止于八卦与六十四卦之数;若不能将符号与物象相对应,易卦系统便会成为没有实用性的空架子,这是不可想象的。从易卦的源来看,易卦符号本身便具足数字性、阴阳化、符号化、象征性等多重哲学意蕴,值得从多角度进行深入阐释。

对易卦符号系统,冯友兰晚年提出“宇宙代数学”一说。他说:“代数学是算学中的一个部门,但是其中没有数目字,它只是一些公式。这些公式用一些符号表示了出来。对于数目字说,这些公式只是些空套子。正是因为它们是空套子,所以任何数目字都可以套进去。我说《周易》可以称为宇宙代数学,就是这个意思。”^[31]^[41]冯先生的这一主张是契合易卦之性质的。所谓“空套子”,即易卦之“象”,虽然有文辞举例解说,但“象”毕竟较文辞更为根本,符号本身是不受文辞局限的,是“空”的、无实质内容的体系;“任何数目字都可以套进去”,那么符号本身又具有整体结构性意义,即可据爻与爻、象与象之间的关系,而代入任何情境或事物来进行说明。若以占筮语境来看,某卦某爻不应局限于某一具体时空,否则便不能用以占筮一切情境,这就是“象”要比言更为根本的意思,“象”才是那个“空套子”;但占筮毕竟需要解释,也就是某一情境、某一事物是可以套进这个象数的“公式”之中,基于象数公式的结构性意义,而确认占筮所得的。由此,关于《周易》古经的符号系统,应在整体上确认其为无具体内涵规定性的(也即不可言说穷尽)、结构性的、整全性的、可落实的意义系统。这种象数意义,当然是极具哲学性的。

除对易卦源起与性质的整体考察外,我们亦需阐释具体象数体例的哲学内涵。譬如,易卦将筮数经典化呈现为七、八,实际就是确立奇偶阴阳为爻的根本性质,这应是此后阴阳思想的重要源头之一。又如,由易卦符号和卦爻辞等可确认六画卦由八卦构成,则具有抽象性、象征性、分类性特征的八卦哲学也内含于易卦符号哲学之中。再如,爻与爻、卦与卦之间内蕴着六爻之时空一体性、今本卦序之结构意义、中爻之趋吉性、阴阳过极之转化、阴阳之消长变化等丰富的象数关系,这些《周易》古经本身所具备的早期象数易例,当然也是《周易》古经哲学的重要内容。

第二,阐明卦爻辞的整体哲学价值。按前文所述,高亨撰《周易筮辞中有无哲学》一文来反驳傅铜之观点时,便是举卦爻文辞,认为《周易》经文中有人生哲学和政治哲学;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中所论的《易传》哲学,有几处实际是《易传》对古文辞的直接称引;而自《周易》古经在中国哲学史论著中出场后,学者们均承认部分卦爻辞有极强的思想性。当然,虽注意到了部分卦爻辞的哲学性,但囿于《周易》古经仅为卜筮之书的主张,这些哲理性极强的文辞却又常被强调与其他多数文辞不同,甚至被借以说明理性与非理性的对立。这种对卦爻辞的认识,显然严重割裂了卦爻辞的整体性。

从卦爻辞的整体内容来看,文辞可分为三个层面:一是对卦爻实然情状的象征描述,譬如“潜龙”便是对乾卦初爻情状的取象描述;二是对卦爻或然吉凶的预测判断,譬如“有悔”主要是对乾卦上九爻的吉凶预测,实然情状与或然吉凶都是一般筮辞中的要素;三是借卦爻情境而对应然作为的申说,譬如“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无咎”“无平不陂,无往不复,坚贞无咎”等显然不符合筮辞的一般特征。由应然作为才能得无咎,这样的文辞言说范式,显然已经超出了单纯卜筮预测的范畴。应然作为层面的卦爻辞,特别能凸显人的价值:既包括“无平不陂”式的理性认识层面之价值,也包括“君子终日乾乾”式的应然作为层面之价值。在卜筮语境中发现人、论说超越卜筮的人文价值,这在《左传》《国语》引《易》之例中也多有展现,而《周易》文辞之所以能被用以阐发道理、彰显理性,显然是因《周易》的作者本就借卦爻辞来申说道理,《周易》古经自身已然具足超越卜筮的内容。本卜筮而超越卜筮,这是《周易》古经的鲜明特色,也是《周易》古经兼具筮书与哲理之书双重性质的重要展现。

除可从应然价值层面确认卦爻辞的哲学性外,结合古经本有的象数体例也是可行的,从各卦文辞

的整体含义出发来确认经文的哲学性。譬如乾卦初爻“潜龙勿用”,若作为单独的一条文辞,并不具有特别的思想性,但若置于乾卦的整体语境之中、置于初爻的爻位之中、置于与其他各爻的联系之中,那么“潜龙勿用”必然指向更为精深的思想内涵,而《周易》的作者撰写文辞之时,显然考虑了文辞与象数的整体结构。总之,对卦爻辞哲学价值的确认,不能仅从独立择取的几条文辞出发,而应充分探讨文辞的整体性质和各卦文辞的整体涵义,即从整体出发,可确认卦爻辞的人文性与哲学性。

第三,阐明《周易》古经与《易传》哲学思想间的连续性。按前文所述,将《易传》哲学等同于《周易》古经的哲学,或者完全割裂《易传》与《周易》古经的联系,都是错误的做法。《周易》经、传、学之间既有基于时代的差异性,又有基于专门之学的相关性。对《易传》哲学而言,近几十年来,学者们长期争论《易传》的儒道归属问题,却很少注意讲明《易传》哲学对《周易》古经的继承与发展,仿佛《周易》经、传之间有不可逾越的研究界线,这是不妥当的。《易传》是解经之书,《易传》哲学的首要来源应是《周易》古经。按前文所论,《易传》中的许多概念、命题与思想,本身就是《周易》古经中的或隐或显之内容。因此,在分观《周易》经传的基础上,充分考察、讲明《周易》古经与《易传》哲学间的连续性,这是研究《周易》古经哲学的重要内容之一。

第四,阐明《周易》古经与商周变革的关系,确认《周易》古经之于周文化的代表性。除割裂《周易》经传外,《周易》古经又常被中国哲学史论著悬置在先秦哲学发展的脉络之外,例如部分论著将《周易》古经附于《易传》之前,其实就是间接认定《周易》古经与《易传》之前的哲学思想无关。倘若我们回溯思想发展之历程,将《周易》古经置于先秦哲学的发展脉络来看,除对《易传》哲学有直接影响外,《周易》古经与商周之际思想变革的关系、与儒道等诸子哲学起源的关系都值得特别重视。

按传统说法,《周易》古经成书于商周之际,或作于文王、周公之手。而根据近代以来的新研究,《周易》古经大概成书于西周初年。从成书时代来看,《周易》古经与商周变革相近,《周易》古经哲学自然可与商周之际的思想变革相印证。具体而言,今人探讨商周之际的思想变革,多据《尚书》与《诗经》的相关篇章^[32],特别关注天命转移之说,即周人认为“敬天保民”则天命会发生转移,这一思想变革凸显了人的出场、道德的出场。按前文所述,《周易》古经本卜筮而超越卜筮,借卜筮的形式开出人的价值,这与借天命而凸显道德的商周思想变革是高度一致

的。又如既济卦九五爻辞云“东邻杀牛，不如西邻之禴祭，实受其福”，按历代注释，此一爻是说“东邻”商纣王用牛祭祀，却不如“西邻”周文王用野菜祭祀，这背后的原因当然是文王敬天保民而新承天命。又按《左传》记载，春秋时期韩宣子访问鲁国，见《易象》与《鲁春秋》，感慨“周礼尽在鲁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与周之所以王也”^[33]¹²²⁷。《易象》必然与《周易》密切相关，观《易象》与《鲁春秋》而知周礼与周公之德，可见，《周易》古经哲学与商周之际的思想变革相关，《周易》是周文化的重要典籍代表。

第五，阐明《周易》古经哲学与诸子哲学的密切联系。《庄子·天下》篇与马王堆帛书《要》篇，都论及经书所载的古之遗言，可见《周易》等经书是诸子的思想源泉。就《周易》而言，孔子五十以学《易》，读《易》韦编三绝，这恐怕与其“五十而知天命”（《论语·为政》）相关。又观卦卦辞云“盥而不荐，有孚颙若”，这与孔子所云“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观之矣”（《论语·八佾》）之行文非常相近。盥与灌，或释为洗手，或释为祭祀敬酒，是“荐”即承上贡品之前的祭祀步骤。“盥而不荐，有孚颙若”是说不必上贡品了，因为“盥”的时候就已经充分展现了其信实的品格；而孔子不欲观“灌”之后的奉献贡品环节，结合观卦来看，恰恰是因为孔子没看到主祭者在“灌”时的恭敬心态。^[34]又既济卦九五爻云“东邻杀牛，不如西邻之禴祭”，即论说倘若自身不具备内在的品格，祭祀厚重也是没有用处的。结合观卦卦辞、既济卦九五爻辞与《论语》所记孔子之语，能看到他们对祭祀礼仪背后所需德行的强调。^[35]孔子生逢礼乐崩坏之时，为恢复周礼，其所寻找到的根本依据就是人心之“仁”，即要把礼乐筑基于人的内在道德倾向之上。由此，孔子云：“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论语·八佾》）这是对虽行礼乐而实际无心灵契合的抨击，这正与观卦、既济卦文辞之义一贯，且关乎孔子最为核心的思想主张。由此例，可见《周易》古经实对孔子有极深的影响。至于《周易》古经与老子及道家的关系，历来便受到关注。^[36]如《汉书·艺文志》便已用谦卦来溯源道家柔弱居下之思想。虽然《老子》书中并未直接引用《周易》古经，但《老子》对阴阳对待关系的关切、对“反者道之动”的申说，与《周易》古经中阴阳爻的根本性质、卦爻象的整体结构、“亢龙有悔”“无平不陂，无往不复”的变化总结完全契合。《老子》的思想不可能凭空产生，就现存文献而言，《老子》思想的源头只能追溯到《周易》古经。以儒、道为例，在中国哲学史的撰写中，应

该讲明《周易》古经对诸子哲学的源头性影响，讲明《周易》古经作为“大道之源”的地位。

[参 考 文 献]

- [1] 胡适. 中国哲学史大纲[M]. 长沙: 岳麓书社, 2009.
- [2] 冯友兰. 中国哲学史[M].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1.
- [3] 钱玄同. 答顾颉刚先生书[C]//顾颉刚. 古史辨(第一册). 北平: 朴社, 1926.
- [4] 顾颉刚. 论易系辞传中观象制器的故事[C]//顾颉刚. 古史辨: 第三册上编. 北平: 朴社, 1931.
- [5] 傅铜. 周易无哲学价值说[N]. 北平晨报, 1936-08-28(13).
- [6] 张岱年. 中国哲学大纲[M]. 增订版. 北京: 中华书局, 2017.
- [7] 谢无量. 中国哲学史[M]. 香港: 中华书局, 1940.
- [8] 高亨. 周易筮辞中有无哲学[J]. 责善, 1940(8): 2-4.
- [9] 梁启超. 评胡适之中国哲学史大纲[J]. 哲学, 1922(7): 1-18.
- [10] 梁启超. 国学指导二种[M]. 上海: 中华书局, 1940.
- [11] 王述先. 易经与唯物辩证法[J]. 知识往来, 1935(3): 5-7.
- [12] 金景芳. 易通[M]. 重庆: 商务印书馆, 1945.
- [13] 冯友兰. 《易经》的哲学思想[C]//冯友兰. 中国哲学史论文集二集. 上海: 人民出版社, 1962.
- [14] 冯友兰. 中国哲学史新编: 上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7.
- [15] 任继愈. 《易经》和它的哲学思想[N]. 光明日报, 1961-03-31(4).
- [16] 任继愈. 中国哲学发展史[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83.
- [17] 北京大学哲学系中国哲学教研室. 中国哲学史[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1.
- [18] 萧蓬父, 李锦全. 中国哲学史纲要[M]. 北京: 外文出版社, 2000.
- [19] 上海师范大学等九所院校《中国哲学史稿》编写组. 中国哲学史稿[M]. 石家庄: 河北人民出版社, 1980.
- [20] 李维武. 中国哲学史纲[M]. 成都: 巴蜀书社, 1988.
- [21] 冯达文, 郭齐勇. 新编中国哲学史: 上册[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4.
- [22] 张学智. 中国哲学概论[M].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22.
- [23] 郭齐勇. 中国哲学史[M].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6.
- [24] 劳思光. 新编中国哲学史[M].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5.
- [25] 刘文英. 中国哲学史[M]. 天津: 南开大学出版社, 2002.
- [26] 张立文, 罗安宪. 中国哲学史教程[M].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21.
- [27] 郭齐勇. 中国哲学通史: 先秦卷[M]. 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21.
- [28] 吾淳. 希腊与中国: 哲学起源的不同典范[J]. 同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9(1): 84-94.
- [29] 丁四新. 数字卦研究的阶段、贡献及其终结[J]. 周易研究, 2018(5): 43-51+72.
- [30] 王弼, 韩康伯, 孔颖达. 宋本周易注疏[M]. 于天宝, 点校. 北京: 中华书局, 2018.
- [31] 冯友兰. 孔丘·孔子·如何研究孔子[C]//冯友兰. 三松堂全集: 第13卷. 郑州: 河南人民出版社, 2000.
- [32] 郭沂. 从西周德论系统看殷周之变[J]. 中国社会科学, 2020(12): 82-98+202.
- [33] 杨伯峻. 春秋左传注[M]. 3版. 北京: 中华书局, 2009.
- [34] 曾令巍. 元代朱子学范式下礼乐互诠关系的义理解读: 以陈澧《礼记集说》为例[J]. 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4(3): 117-123+144.
- [35] 秦洁. 《周易》“观盥而不荐”与《论语》“禘自既灌而往”通释[J]. 周易研究, 2024(5): 57-66.
- [36] 杨庆中. 《周易》古经对老子思想的影响[J]. 周易研究, 2022(5): 36-44.